

建筑学博士论丛

创造与评价的 人文尺度

中国当代建筑文化分析与批判

徐千里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建筑学博士论丛

创造与评价的人文尺度

——中国当代建筑文化分析与批判

徐千里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创造与评价的人文尺度:中国当代建筑文化分析与批判/徐千里著.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

ISBN 7-112-04134-1

I. 创... II. 徐... III. 建筑-文化-研究-中国

IV. TU-8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0275 号

建筑学博士论丛

创造与评价的人文尺度

——中国当代建筑文化分析与批判

徐千里 著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印刷(北京阜外南礼士路)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 字数: 350 千字

2000 年 4 月第一版 2000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500 册 定价: 23.00 元

ISBN 7-112-04134-1

TU · 3256(9608)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是经常地、反复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是给人心灌注时时翻新、有增无已的惊奇和敬畏：头上的众星的天空和内心的道德的法则。

——伊曼努尔·康德

建筑师的任务并不在于设想出技术解答，而是将它们转化，转为人性化：最好的合乎人类需要的解答，并不是最好的技术解答或经济解答。因此，这不能简单地归纳为若干技术上的最优解答和总和，甚至也不能是各种技术的最优综合。技术上的最优化仅指它本身的内部规律而言，与人类的定论无关，而建筑师在技术的介入上赋予它以人类的意义。

——密舍尔·科纽约尔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绪论 人文精神——文化批判的历史与主题	7
一 人文精神与文化批判	7
二 建筑文化批判——意义与目标	34
第二章 建筑批评的基点与逻辑	53
一 建筑何为：价值的寻思与追问	53
二 尺度·视野·方法	70
三 解构与建构	85
四 建筑话语转型与建筑文化批评	99
第三章 创造思维的人文基础	121
一 创造的本体论含义	121
二 建筑作为事件	134
三 建筑作为语言	156
四 建筑作为艺术	178
五 形式与意义的定位	205

第四章 建筑的审美之维	227
一 建筑的存在方式及其美学含义	227
二 走向过程:生活的审美化和审美的生活化	238
三 解释·接受·作品构成	246
四 建筑的审美之维	271
第五章 生活世界与形上追求	291
一 建筑文化作为一种生存战略	291
二 大众文化批判	312
三 生活世界与形上追求	328
结束语 走向新文化	360
主要参考文献	370
后 记	374

前言

还在八九年前,当我以“多元文化中的当代建筑审美取向”为题,着手撰写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时,即已开始思索这样一些问题:在这个多元共存、仿佛没有标准、许多价值判断都失去意义的时代,建筑活动及其发展是否还存在某种内在、必然的准则、方向和尺度?如果存在,它们是什么?我们又当怎样去寻觅和把握它们?……显然,与其说关注和研究这些问题是我个人的兴趣使然,毋宁说它是每一个严肃思考当代建筑问题的人都必得面临和回答的问题。不过,多年的研读和思索,虽一直为这些问题所困扰,却似乎并没有求得一个十分清楚的答案,问题本身倒像滚雪球一样,反而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沉重。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有关的思考毫无意义。至少,它使我更进一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从而不得不对以往的思索本身进行反思,不得不下决心从更加根本的层面对这些问题进行再思考,并由此形成了这篇论文的基本内容和思路——中国当代建筑文化分析和批判。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我国建筑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为这种发展和成就而欣喜的同时,人们又普遍地感到一种困惑与迷惘,一种物质的繁荣与喧嚣背后掩饰不住的思想的空虚和贫乏。尽管我们引进了大量西方建筑的理论、思想,借鉴了许多新潮的风格、流派,并运用过种种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成果来谈论建筑:信息、反馈、系统、耗散……,也掀动过一次次推陈出新的浪潮:现代的、传统的、后现代的、新理性的、新乡土的、新古典的、寻根的、解构的……然而,等到潮退之时,却发现建筑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解决,有些还变得更加突出、尖锐,甚至一些原来不成问题的东西也成了问题。于是,我们不得不再次发问:建筑是什么?建筑艺术是什么?它对于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无疑,这是关于建筑的最基本的问题。也许正因为它们太平常、太

简单,才很少为人们所重视,更很少被认真思考。但实际上,这又是真正具有深层意义的问题,因为它直接关涉建筑的本体和本体论。

建筑的本体论是对建筑存在的反思,是对建筑意义和价值的领悟与揭示。关于建筑的一切论争的深层都必然在本体领域展开。当代人对建筑活动的困惑与迷惘归根到底是对建筑本体的困惑与迷惘,或者说,是由于建筑本体的被遮蔽。不过,遮蔽的原因却不在传统意义上作为物的生产的建筑活动自身,而是有着更加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换句话说,建筑活动中真正具有深层意义的问题并不是传统意义上“建筑本身”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文化问题。正如曾经设计西尔斯大厦和芝加哥汉考克大厦的结构工程师兹勒·康所说:“今天没有真正的困难,我们能够建造一幢 150 层的建筑,……不论我们是否愿意,以及城市如何处理它,这不是一个工程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①

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归根到底则是人的问题,更确切地说,是人的存在的问题。建筑与人的存在之间那天然的不解之缘,使对建筑意义的探索成为对人的生存与生命活动的一种整体揭示和敞亮。而正是在对建筑活动的不确定性加以确定的本体反思之中,在对建筑的物质形态所蕴含的深层超越性意义的洞悉之中,我们发现,建筑本体一方面在人类现实的生活世界和生活过程中展开,另一方面又为日常感性的麻痹而遮蔽。这导致了今天建筑活动中普遍而严重的本末倒置的现象与追求;实际上是建筑活动的异化,而这种异化又是同当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人的异化同源的。因此很显然:要对当代建筑活动进行真正深入的反思和批评,就必须把视野扩展到整个文化领域,使建筑的批评成为一种文化的批判,一种价值观念和人生态度的批判;而人文精神、人文价值和人文理想的建构则应当也必然成为这种批评的目的和追求。这正是本书的基本出发点和思想基础所在,也是我们强调人文尺度和人文精神的主要原因所在。

人文精神说到底是一种自由精神,因而也是一种审美精神。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美学的终极追求和关怀就是“人的解放”,或者说“人的

① 引自戴复东:“美国高楼概述”。《世界建筑》,1994 年第 4 期,第 13 页。

自由”，而这种解放和自由又是人通过以全面的感受去面对世界而实现的。因此马克思说，“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①在批判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论时，他指出，“以前的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②而霍尔巴特则更直截了当地宣称：“感觉就是一种存在方式。”^③于是，当代美学抛弃了传统美学的自然本体论或理性本体论，而日益成为一种“生命本体论”。它把生命解释成人的价值存在、人的超越性生成和人的终极意义显现，认为这才是人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本原。这种对活生生的人的“生命活力”、“精神意志”加以强调和高扬的转变，无疑是本体论上的一次“革命”，它涤荡了以往本体论的非人性化倾向，确立了生存本体论的地位。于是，对一切本体，包括建筑本体的昭示，都意味着对传统的“无根的美学”现状的自觉和批判，同时也意味着将人的全部生命活力、生命形式以及丰满生动的生活过程加以还原，从而使现实世界成为真正属人的生活世界，成为人们“诗意栖居”之所。

为此，建筑的本体必然是“人化”的本体。它不再是与人对立的纯粹的实体世界，而是我们生命活动中鲜活的感性认知，是人的现实生活、衣食住行，也是人的想象、激情、盼想、回忆与爱怜。在建筑活动中，人所能把握的，都把握在感性之中，人所能超越的，也只有通过感性去超越。正由于人类主体精神的充盈的生命是以真性情、真血性为本体，它才在对人与其生存环境的本体反思中，使对建筑本体的批判成为对自我的批判，对建筑本体的领悟和反思成为对自我的领悟和反思。因此，我们的研究才不是把建筑作为单纯物质的客体对象，而是始终将其同人的生活过程和生命活动联系起来考察，并始终以人的生存意义与价值作为自己的目标指向；即使运用相关的哲学思想与方法如结构主义、解释学、现象学、接受美学等，也无不在方法论的层面中透露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6页。

③ 霍尔巴特：《自然体系》（上），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99页。

本体论的意向，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触及了建筑作品的存在方式与本体结构。正是这种由方法向本体的推进，才使建筑本体论的研究成为可能，并得以深入。

建筑本体论因其与人类生活实践相契合而获得直观性和自明性。它毫无玄奥神秘之处，却是完全属人的真理。它呈现在建筑对人的生活过程和生活意义的关怀与拷问中，蕴含于建筑作品的存在方式及其对人的影响方式中，贯穿于公众日常生活与建筑作品的解释学应答和现象学追问中，展露在当代人的审美生成与心灵唤醒的生命活动本体过程中。可以说，建筑本体论就是对建筑活动（创作、作品、接受）过程的总体把握，是对人本体和建筑作品本体的双重追问。

因此很自然，我们对建筑的思考常常越出“建筑本身”的阈限，而关注更广泛的领域和问题。甚至，当我们把建筑的批评真正扩展为文化的批判，建筑活动便必然被置于人类整体的文化活动和社會生活中去考察，并成为这个整体的一部分，于是，许多以传统的眼光看来与建筑无关或关系不大的事务也将进入我们的视野。但我们不应把它视为一种避“实”就“虚”或回避问题的研究方法和态度。相反，它实际上正是把建筑置于一种更加真实、全面的背景与关系——文化场——中去探究其发展的意义、规律和前景。而这种对建筑的思索，说到底是对人的存在的思索（从而也是对建筑活动最根本和最彻底的思索）。所以，人文精神和人文尺度就应当也必然成为贯穿这种思索的中心主题和基本准则。

当然，我们十分清楚，在世纪将去之际，我们对建筑文化的这种思考将并不轻松。由于现代商业文化和拜金主义的泛滥，当代人的价值系统遭到了虚无主义的浸渍，许多应有的人文价值与人文理想在萎顿，对真善美的追求在消解，而生命的意义和艺术的精神也在工具理性话语的操作中日趋泯灭……，这使当代人的人生信仰和价值观念陷入深深的危机，因此，许多与生命活动相关的问题都面临深刻的矛盾，面临真实与虚妄的冲突，建筑问题也不例外。当代建筑活动中种种根本性矛盾的愈演愈烈，价值观念的日趋淡漠，以及各种无意义的行为和思想的盛行等等，都绝非偶然。在如此严峻的文化处境中，可以肯定，我们

对建筑本体的价值追问将会遇到重重困难和障碍。但是,这并不表明这种追问不可能或无意义,相反,它恰恰证明了这种追问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因为这种追问是对生活世界的判断和选择,是对生命本真的求索,尽管这种求索并不轻松,但我们“别无选择”。所以,面对建筑价值的日益丧失和人文精神的严重失落,我们更须追问。本书作为站在这样的角度思考建筑问题的一种尝试,肯定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因此热切地希望得到同行、专家的批评。同时,这种思考的路向本身能否引发更多更有价值的探索,则是笔者更为关注的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对“当代建筑文化”的分析和批评主要集中于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建筑活动和现象。由于我们主要关注的不是个别、具体的作品,而是作为整体的建筑文化和思想,而文化、思想总是具有明显的历史关联性和承继性,所以,为讨论问题的方便和需要,不拟对“当代”一词作时间上的严格界定。

第一章

绪 论

人文精神——文化批判的历史与主题

一 人文精神与文化批判

哲学深深地扎根于哲学之外的问题之中。

——卡尔·波普尔

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

——恩斯特·卡西尔

1

20 世纪 90 年代初，在中国大地上曾经悄然涌动起一股思潮，这就是对“人文精神”的“寻思”。而今，“人文主义”、“人文精神”已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论题，它甚至引导出文化思想领域一系列新的话语，这是有目共睹的。然而，这种现象的出现却并非偶然，在它背后所隐伏着的，是十分深刻的社会历史的动因。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在我们即将与 20 世纪挥手作别的时候，回顾一个世纪来人类所走过的道路便可以清晰地看到，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文主义思潮的二重变奏构成了整个世纪哲学的整体形象，从而也展示了当代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宏观走向。科学主义和人文主

义之所以能汇成彼此颉颃的两大哲学思潮固然有其历史的渊源，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其现代文化背景。就西方社会而言，这种文化背景是十分清楚的：在近代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取得辉煌胜利之后，在随着基督教文化的崩溃和上帝之死而带来的价值真空和心灵失落之中，现代西方哲学家对科学、理性、价值和人生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沉思；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文主义思潮正是在这些关系到现代西方人如何安身立命，怎样寻求发展的问题上分道扬镳的。而对于非西方社会而言，这种文化背景虽不尽相同，但是就人类思想的发展来看，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总是存在着相互的联系和影响，这种联系和影响随着当代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和密切而更加显著。今天，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无论其经济、文化、政治状况存在着多么巨大的差异，这个越来越“小”的地球正日益将越来越多共同的问题摆在人们面前，要求他们去面对和处理，促使他们去思考和关心，确是一个不辩的事实。而“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无疑是其中最重要、最不可回避的问题。正因为如此，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便不仅在西方，而且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成为 20 世纪的两大思想主潮。

科学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潮是与实证主义，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分不开的。在本体论上，它拒斥形而上学，主张用科学方法，尤其是逻辑方法分析问题，以取消有关世界本源的探讨；在认识论上，它反对非理性主义，崇尚理性主义和泛逻辑主义；在方法论上，它反对方法的多元化和人文学方法的独特性，而独尊科学方法和逻辑方法，把自然科学方法奉为主臬以统辖一切学科（包括哲学和人文学）；在语言观念上，它力图扫除日常语言中的多义性和歧义性，主张用逻辑方法建立一种精确的、描述性的、还原性的和工具性的理想语言；在人学问题上，它反对采用“理解”的方式和“表意化”的方法，而主张从精确科学的角度规定人的本质和特性，进而对人生和价值问题作出规范化和实证化的说明；在科学观上，它反对科学悲观主义，鼓吹科学万能。

相反，人文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潮是与非理性主义浑然一体的。在本体论上，它反对科学方法染指哲学，反对放逐本体论的计划，主张以本体论为哲学的中心，倡导终极关怀和本体追求的精神，试图为心灵失

落的现代人重建安身立命的形而上学;在认识论上,它反对唯理主义和泛逻辑主义,崇尚诗性逻辑;在方法论上,它反对科学方法的独断性和普效性,主张重视想象、隐喻、内心体验、无意识探索和解释学等;在语言观念上,它反对逻辑语言的一统天下,反对把语言降格为工具,强调语言的非精确性、非描述性和非还原性,力主语言的本体性和人文性;在人学问题上,它反对把人当作科学的对象和理性的奴仆,主张从诗性的途径去把握具有情感、直觉、欲望和意志自由的人,在“价值重估”的旗帜下重新揭示人的存在本质、意志自由和价值内涵;在科学观上,它反对科学乐观主义,主张摆脱科学的枷锁,消解科学极权主义。

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文主义思潮的差异和对峙必然在二者之间形成冲突和消长的态势,形成一种张力关系,这种张力关系就构成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二重变奏。在当代哲学舞台上,这种二重变奏所发出的主旋律是:一方面,在某些过去一直受着科学主义笼罩的学科里,出现了走向人文主义的趋势;另一方面,由于人文主义更能适应当代社会中人们的特殊情绪而显示出自身的优越性,因此它能在新的高度和新的层面包容科学主义的某些合理因素,从而在当代社会里形成了以人文主义思潮为主导、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相融合的哲学格局。^[1]

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作为人类的思想方式和文化发展路向,并不是我们时代的产物,它们都可以追溯到很远很远。也正因为如此,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在现代文化背景下的冲突和消长才更显得意味深长。庞朴先生曾经这样写到:“人文主义一词,通常专用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世俗化思潮。虽然这个思潮被指认为是对希腊古典文化的复兴,却很少见到有谁称誉希腊文化为人文主义的。因为人文主义,乃相对于欧洲中世纪的‘神文’主义而言,所以尽管古希腊的文化从智者派开始,到雅典学派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已经把视线从自然转到人本身,只因为没有‘神文’与之相对,也就未曾博得人文的雅号。”“如果我们不去计较人文主义得名的历史原因,单从文化的性质着眼,则应该说,人文主义的适用范围,决不限于文艺复兴那一个时期,也不止于欧洲西部的那一块地域。放眼世界,拿希腊、印度、中国这三大古老文明做比较,人们会承认,以伦理政治为轴心、不甚追求自然之所以、缺乏神学宗教体系的

中国文化,倒是更为富有人文精神的”。^[2]

事实上,所谓“人文精神”,在最普遍的意义上,是指人类对自身存在的思考;是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是对人类命运的理解和把握。但问题在于,人的命运、人的价值、人的存在意义等概念本身又都具有多义性,它们只在特定背景和条件下才具有实际的意义,因此,人文精神这一概念同其他词语一样,受到语境因素的制约。不同时期、不同语境里的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关注自然是不同的,因而不同的时期应该有不同的人文精神内容。回顾历史便不难发现,14世纪欧洲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所关注的焦点和内容与现代人文主义所关注的焦点和内容是有很大不同的。

但是,无论人文精神的内容怎样变化,一个明显且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人文精神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存在并发挥作用的,因为只要人类存在一天,便不会停止对自身命运的思考和把握,便必然要追求自身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事实上,人文精神的每一次高扬都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由于自然、社会、文化等种种原因致使人性受到压抑和摧残后人类为寻求自身发展和人性复归的必然抗争。古希腊的人文精神是希腊人在将自身同自然区分开来,理性的曙光刚刚出现时人性的第一次觉醒,因而这种人文精神可视为人类对束缚自身的自然力量的抗争。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名士们的放浪形骸、傲视天下,体现出人性的自觉,是对封建黑暗专制下无常人生的抗争。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是对西方中世纪宗教神权扼杀人性的抗争。而近代以来,随着近代科学革命以及接踵而至的启蒙运动,人类在改造和征服自然中获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就,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业绩;然而,就在人们醉心于科学的伟力,拜倒在唯理文化脚下的当口,首先在西方,继而在更大的范围内,一批批有识之士举起了人文主义的大旗,更是一次维护人性尊严的全面抗争。它所反抗的,乃是近代以降唯理文化背景后的暴君式专断,因为这种文明使“理性”取得胜利,却试图把人类所有其他精神能力加以奴役和压抑。因而,面对这种“理性的暴虐”,现代人发出了“为人文世界保留地盘”的呼声……。总之,人文精神就如人性的守护神,敦促并引导着人性“永恒的回归”:无论什么时

候、什么地方，只要人性受到压抑和摧残，人文精神就一定会在那里高扬。

2

现代人文主义思潮在对近代以降唯理文化的抗争中滥觞，因而它的意义便超越了对哲学传统本身的批判和反思，而更具有文化批判的哲学倾向和思想品格。

我们知道，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常被称为经历了一场“认识论转向”，而康德雄心勃勃的“纯粹理性批判”正是以宣称对人类“知识”和“理性”作了彻底的“批判性”考察从而完成了这一转向的。当这位哥尼斯堡的哲人被休谟从科学独断论的睡梦中唤醒之后，其当务之急便是批判性地审察人类理性，回答什么是知识、知识如何可能、什么是理性的界限等认识论的根本问题，从而为硕果累累的科学之树培植不可动摇的理论根基。但是，每一个稍有西方哲学史常识的人都不难看出，从笛卡尔到康德，在他们眼中能够真正当得起严格意义上“知识”之美名的，实际上主要地甚至惟一地只是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知识；纯粹理性批判的结果，是在现象与物自体之间掘出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而使本已四处蔓延的二元论进一步合法化。鸿沟的此岸是通过人的先验构架整合过的、可以被科学所把握的“现象”世界，鸿沟的彼岸是理性不可知的“物自体”世界，即本体世界、道德世界和审美世界。“头上的众星的天空”与“心中的道德的法则”虽然唤起过康德“越来越大的惊奇和敬畏”，但康德最终未能在二者之间建起一座桥梁。于是，以费希特为肇始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者力图解决康德难题，以弥合那分裂已久的世界。但由于他们无论在研究主题还是研究手段上均未跳出近代哲学传统的窠臼，因此他们寻觅世界统一模式的企图虽然动人，却往往只能停留在渴求水平。二元论的大树已深深根植在传统思辩哲学的土壤之中，无论是费希特的绝对自我、谢林的绝对理性还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都无法将其撼动。尽管这些德国古典哲学大师对二元论的世界图式作过这样那样的修正和弥补，但这无非使之增添了些许思辩的色彩，而在理论预设和理论框架上并未越出二元论的雷池一步。无怪乎卡西尔